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媒介与社会变迁:战后日本出版物中变化着的价值观念/诸葛蔚东
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2

ISBN 7-301-11342-0

I. 媒… II. 诸… III. 出版工作—研究—日本—现代 IV. G239.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46152 号

书 名:媒介与社会变迁:战后日本出版物中变化着的价值观念

著作责任者:诸葛蔚东 著

责任编辑:许迎辉

标准书号:ISBN 7-301-11342-0/C·0438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zpup@pup.pku.edu.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824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65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16 印张 220 千字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6.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内容提要

本书从战后日本出版物中表现出来的价值取向的视野,分析了战后日本社会转型时期的阅读取向和媒介环境,勾勒出了战后日本出版物中价值取向的变迁过程,并在社会变迁的脉络中考察了出版物在出版载体、内容和价值取向等方面所发生的变化,对媒介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做了具体的论述。

第一章 绪 论

1. 问题的提出及研究目的

1.1 作为“酵素”的印刷媒介

媒介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联始终是媒介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议题。L. 费夫尔在 20 世纪中期曾就出版物和现代社会的形成之间的直接互动关系做过开拓性的研究。L. 费夫尔在《印刷术的出现》中称,在西方社会中,作为物质形态的书是一个迟到的晚辈,从 15 世纪中叶起,它开始为一般人服务。书是 1450 年前后才出现的,这时一些不同寻常的抄本开始出现在西欧的北部地区。这些抄本的外观看起来与传统的抄本没有太大的区别,但其字迹是利用印刷机通过活字印在纸或者羔犊皮上的。印制的过程虽然简单,但还是令人感到好奇甚至惊叹。实际上,这是新一代的书籍,这种书籍不仅让人们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且也让最主要的读者群——教会人士与世俗的学者得到了全然不同的工作环境。

这里所说的书籍显然是现代意义上的作为大众媒体的印刷书。值得一提的是,L. 费夫尔不但开创了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书籍的先河,而且让人们思考这样一些问题:随着新媒体的出现,书籍的未来也越来越不明朗。书籍究竟适应了人类的何种需要?在人类社会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它究竟扮演了何种角色?

L. 费夫尔认为,文艺复兴是印刷文化的直接结果。在文艺复兴之后,欧洲又迎来了另一个伟大的时代和一个骚乱的时代。在浪漫主义的旗帜下,新的革命思想和情感得以产生。在随之而来的工业社会中形成了一种阶级意识,这种意识又在驱使人们采取行动,去实现自己的要求。L. 费夫尔指出,在理解印刷书籍的历史

作用时,必须注意到的一点是,它对于人们观念交流的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为欧洲社会本质上是贵族统治的社会,而且,在印刷术发明前后,始终遵奉一种长期的文化传统,学习被看成是某些社会集团所应独享的权利。但是,印刷书籍却最终改变了这一切。L. 费夫尔还认为印刷书籍怎样改变了社会上各种不同的关系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此外,印刷术是如何形成传统的延续的也同样值得研究,如印刷术是如何把古登堡时代的人与希腊、罗马、早期基督教会等三大古文化连接贯通的。在印刷术发明以后,欧洲人对于世界的认识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1492年起,欧洲人开始海上探险,而在这之前,欧洲人所拥有的阿奎那时代的世界观与2世纪的托勒密并没有太大的差异。印刷术早于地理大发现,也早于地动说,印刷术在当时诸多的变化里扮演了其所应该扮演的角色。^①

此外,还有观点是从阅读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的视角来分析印刷物对于社会变迁的影响的。在分析英国的近现代阅读文化史时,R. 奥尔蒂克认为,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阅读文化根植于历史的深层,绝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它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结果,主要有政治的、宗教的、经济的和技术的因素。^②与以往相比,在工业社会的生活环境中,阅读开始变得日益重要,普通的英国人在现实生活中迫切地感受到了各种必要的需求。如一个稳定的工作、较好的收入和工作环境、组织工会的权利和在政治上的影响。工业化的生活环境对于个性和自我形成了压制,长时间工作在工厂和店铺,使人们在精神上不堪重负,人们在业余时间希望能找到消遣、宣泄和解脱的渠道,而“图书和杂志是显然的答案”。^③

R. 奥尔蒂克强调,社会生活对于阅读并没有直接的影响,有的生活因素有可能会引起人们的阅读兴趣,有的则不利于人们养成阅读习惯。就应如何理解普通的英国人为何会成为读者来说,最

^① 参见 L. 费夫尔、H. 马丁:《书籍的出现》(上、下),关根素子等译,东京:筑摩书房,1998年;L. 费夫尔、H. 马尔坦:《印刷书的诞生》,李鸿志译,台北:猫头鹰出版社,2005年。

^② Richard D. Altick, *The English Common Reader: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Mass Reading Public, 1800—1900*,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7, p. 3.

^③ Ibid., p. 4

重要的是要考察当时占主流的社会和政治观念以及宗教信仰,必须分析人们的主观意识,这种观念形成于几个世纪以前,并且在法国大革命的恐慌中得到了强化。……实际上,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看,大众阅读的历史可以看作是英国民主化的历史。^①

也许可以这么说,最初的识字和阅读能力带给个人的是力量,但在更多的人获得了识字能力之后,给社会带来的则是民主化。事实上,英国的阅读文化史也说明了这一点。

1789年,酝酿已久的法国大革命爆发,革命所带来的社会震荡也波及到了英伦三岛。1790年11月,埃德蒙·伯克写了《法国革命反思录》一书。在书中,他写到,法国革命是一场造成社会混乱的暴乱行为,与国王的专制相比,鲁莽的大众并不会好到哪里去。然而,最让他担心的是这种事态也会在英国发生。这本小册子出版后很快就销售了3万多册,在不同的社会阶层当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由此而引起的大辩论中,最为引人关注的应说是潘恩的《人的权利》。该书的第一部分出版于1791年3月13日,在出版后数周内便销售了5万册。1792年,该书的第二部分问世,在一个月的时间内也销售了32000多册。到1793年,据说该书共发行了20万册。潘恩在1802年写道,(该书)在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销量在40万到50万册之间。7年以后,在潘恩去世时,单是第二部就销售了近150万册。1801年,当时英国的人口总数为1500万,如果这个数字准确的话,在潘恩的书出版后,在17年的时间内,每10个英国人中就有一人有一本《人的权利》(第二部)。“在最初的2年内就销售了20万册,几乎令人难以置信。”^②

尽管在近半个世纪以后,当W. 克莱尔再次就18世纪的英国阅读文化进行考察时,他认为潘恩的《人的权利》发行量为100万册之说有夸张之嫌。^③但这种发行规模已在某种意义上说明了阅读与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克莱尔还提到,有学者认为英国

^① Richard D. Altick, *The English Common Reader: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Mass Reading Public, 1800—1900*,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7, p. 3.

^② Ibid., pp. 69—70.

^③ William ST Clair, *The Reading Nation in Romantic Perio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25.

在 1695 年废除图书审查制度与英国人的心智解放有很大的关联,这一制度性的变革有助于英国文学在 18 世纪的兴起,而且,这种变革的成功与英国人崇尚实用主义的民族精神有关。而就法国来说,其所进行的一场根本的制度性变革是以残酷的革命为代价的。^①

1.2 几个界定

本书拟按上述理路对战后日本出版物与社会变迁的关系进行考察。

经过美国式的民主化改革,战后日本出版业实现了产业化革命,创造出了发展和繁荣的神话。在探讨战后日本出版业迅速发展的原因时,可以认为,战后日本出版物中多元化的价值取向,是战后日本出版业中一个极为活跃的动原(Agents),对于推动日本出版业的发展和出版市场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本书拟在社会变迁的脉络中,就战后日本出版物中多元化的价值取向的形成和变化过程进行一番考察,并对战后日本出版业的形成和发展轨迹、社会转型时期的读者取向与社会意识的变化以及出版业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做一具体分析。

就战后日本出版物来说,其领域大致可以分为大众读物(Trade Books)、学术出版物(Academic Books)和教材(Text Books)这三个部分。由于本书试图从出版与社会意识的互动的视野来把握战后日本出版价值取向的变迁过程,因而在这里不把教材作为本课题的考察对象。再者,由于日本出版文化与我国不同,日本的大众读物除了有一种低俗倾向之外,还有一定的亚学术特征,并且学术含量较高,这便使得大众出版物和学术出版物之间的界线有时甚为模糊;况且,日本的学术出版物又有通俗性的一面,有时往往很难对这两者加以区别。本书对此将采取从该出版物市场定位的取向和在学界的影响等方面加以区别的方法进行论述。需要说明的是在这种区分之间,有时并不存在绝对的区别,这里所做的区分,只是本书的一种划分和界

^① William ST Clair, *The Reading Nation in Romantic Perio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84—85.

定方法。^①

在价值论中,价值被定义为人对外部世界的反映,或者是任何有兴趣的对象。价值也可以分为客观的价值、主观的价值、兴趣的价值、情绪的价值、实证的价值、实用的价值等层次。^②本书中的价值取向是指表现在战后日本出版物中的人们的需求、兴趣和目的等行为和思维方式倾向。

鉴于出版物的多样性和本书在篇幅上所受到的限制,本书在考察战后日本出版物中的价值取向时将只着重考察其与社会转型和社会意识的发展脉络相关联的一面,以不同性别、年龄和社会阶层等社会分层为依据的价值取向不是本书所要着重考察的问题。

在日本,出版主要包括图书出版和杂志出版这两大领域,因而,本书的考察范围也主要是战后日本的图书和杂志出版。

再者,鉴于经济基础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一国国民文化水准和价值取向的形成,本书所考察的范围,主要以战后日本经济成长前后的出版物中的价值取向的变迁为研究对象。

战后日本的出版业与战前相比具有迥然不同的传播倾向,日本出版业在战后所发生的最大变化就是出版业在一定意义上开始成为一种产业,出版业中的读者定位机制得到了制度上的保障。本书还考察了日本的出版媒体由专制式传播模式向信息化社会的传播模式转换过程以及读者价值取向、读者心理以及读者需求在市场化的环境下对出版业的影响。这里所研究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出版业在导入了多元化的价值体系和市场化的机制后,出版业将会发生怎样的转型和变化。

传播学中的培养理论认为,在现代社会中,电视已成为普通家庭中的一名成员,并且,由于电视成为信息的主要来源,人们的世

^① 如果把中国大学出版社和日本大学出版社的出版物做一番比较的话,还可发现日本出版文化和中国出版文化的差异。一般说来,日本大学出版社的定位是学术出版,而中国大学出版社则在学术出版之外,还有一大部分是普及性的大众读物。日本大学出版社协会有关人士认为中国大学出版社应与社会上的出版社在读者定位上区分开来,在发达的出版市场中,分工是必然的趋势。还有观点认为中国出版业中的这一现状是中国的出版业分工不细且不太成熟的一种表现。

^② 冯契主编:《哲学大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年,第581-582页。

界观、价值观和生活意识也大都通过这种信息交流被“培养”了出来。^①虽然这一理论的主要分析对象是电视,但也同样适用于印刷媒体。因为在影响人们观念的形成方面,电视媒体和印刷媒体具有相通之处。不妨认为,如果说电视是通过感官的形式在对人们进行“培养”的话,那么出版物则主要是通过观念世界,通过阅读和思考这种互动的方式在改变着人们的价值观念。

战后日本的出版业在试图影响日本的政治和国民意识方面做出过不懈的努力。尤其是在社会转型时期,出版业也同其他媒体一样,在舆论的形成和取向上起到了扶植和诱导的作用。在对战后日本出版物中的价值取向的变迁进行分析时,本书对具有代表性的出版业者的价值取向也进行了分析。

战后日本的出版业和读者取向的互动关系是本书的主要考察对象。作为研究素材,本书将把不同时期的畅销书作为分析对象之一,以把握战后日本出版物中价值取向的变迁。

1.3 由媒体看价值取向变迁的意义

历史地看来,了解日本人价值取向的变化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尽管人们常说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但现实中的许多事例表明,我们对日本某些问题的分析和认识与现实中的日本仍有一段距离。

如在2005年日本举行的众议院大选中,以小泉为首的自民党再次获胜,这一结果似乎超出了我们的一些观察家和对这次选举感兴趣的人们的预料,因为小泉邮政民营化相关法案的被否决以及他在历史问题上的强硬姿态,至少给了我们一种印象,他的执政方针在日本是不得人心的,甚至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一个时期内,只要是对日本的政局感兴趣的人,都会从相关评述中得到大致以上的结论。

^① Jennings Bryant/Susan Thompson, *Fundamentals of Media Effects*, McGrawHill, 2002, pp. 100-101.

然而,现实的问题是,小泉再次获胜,而且还是以压倒性的优势当选。这一现象的确让我们感到困惑,不知如何才能理顺今后的中日关系和认识现实中的中日关系。

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使中日之间的相互认知失去了机会。在一些历史时期,中日之间的相互认知主要是通过媒体来建构起来的,冷战时期尤其如是。正如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的一些知识分子主要通过中国的报刊等出版物来认识中国,把中国看成“理想国”一样,对于中国来说,日本也完全是一个陌生的国度。一个时期内,我们对日本有一种优越心理,在被称为“拟态环境”的媒介之中,日本的形象也是片面的。我们对日本采取的更是一种近乎全盘否定的做法,尽管在 20 世纪 70 年代,印有“日本尿素”的化肥袋被我们一些人当作布料,但在观念中我们仍然认定日本是应被否定的。在报道日本时,是尽力寻找其阴暗面,如在东京街头发现了一个戴口罩的人就马上把他拍下来,以说明东京的空气污染是多么的严重。在 70 年代后期,人们的观念发生了些许变化,我们的媒体在一定程度上开始对日本进行正面的报道。但是,在这种报道的最后,总要有一个转折,一定要指出其负的一面。把日本的“奇迹”当作“经验”来研究则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的事。

在进入改革开放的时代以后,为了发展经济,我们虽然引进了日本先进的技术,但对于技术背后的文化、体制和社会心态,我们仍然缺乏研究和进行深入的报道。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还有观点认为日本的经济奇迹是儒家文化的结果。恰成对照的是,正如同一些日本人更认同欧美而非亚洲一样,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有的日本学者认为,日本经济的奇迹非但不是儒家文化的结果,甚至认为日本文明不属于亚洲文明的范畴。近年来在日本进行的一些舆论调查结果也表明,有许多日本人从内心深处对亚洲文化没有认同感。

在我们与日本交往和认识日本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一些障碍。在 20 世纪初,随着西方势力的东渐,“同文同种”这一据说由日

本浪人创造的词汇一时间成为表述中日关系的关键词。尽管对此有不同的解释,但其大致的内涵是中国文化和日本文化具有相似性和共通性。其实,这种模糊的概念曾给中日关系带来了莫大的伤害。20世纪初期,日本奉行扩张主义政策的右翼团体和人士,曾以此为借口来笼络人心,以达到吞并中国的目的。同样是这样一种概念也使得一些人误认他人为“同类”,以致做出了有辱国格的行为。实际上,中日两国之间在文化上还是有很大的差异的。如果说语言是民族文化的根基之一的话,那么在中文和日语之间,我们能看到的更多的是差异性。关于日语的语系问题尽管有多种说法,如日语属于阿尔泰语系等,但尚没有证据表明日语和汉语同属一个语系。汉字在日语中只是一些被借用来表意的部分语言符号,在日语的语言结构中属于极为表层的部分,并且,中日两国对于汉字还有不同的解读。日语与朝鲜语等语言在结构上的相似性也排除了中国和日本两国“同文同种”的说法。实际上,在中日两国相互交往的过程中,人们常常发现彼此之间在价值取向上存在着非同寻常的差异。

发生在东亚的近代化进程,在中日两国人民的心中留下了不同的烙印,不同的记忆和际遇使得两国人民各自习得了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以往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

1885年,日本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福泽谕吉提出了“脱亚入欧”论,主张在国际事务中谢绝东方的“恶友”——中国和朝鲜。大概从这时起,中日两国之间便产生了另外一种不同的交往史。日本不再奉中国为师,两国间的摩擦开始不断升级,直至日本开始武装侵犯中国。日本“欺凌”中国的这一段历史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而告终。日本对侵华战争等历史问题有不同的认识,不少日本人视这场战争是针对白人殖民者的“解放战争”。如何克服分歧、达成共识,是当时中日建交交涉中的焦点问题。

如今,在谈到当今的中日关系时,人们多用“政冷经热”来表述,这种“政冷”实际上所表明的是两国之间存在隔阂和缺乏沟通

和了解现状。在日本,对中国有兴趣的年轻人越来越少,2005年“北京·东京论坛”公布的调查结果表明,近40%的日本人对中国印象欠佳,而在中国则有近70%的人对日本有反感情绪。这一现象表明,中日两国在价值取向上的共通之处也日趋减少。同时,这也说明了对战后日本社会中价值取向的形成轨迹进行研究的必要性。

2. 对先行研究的评述

2.1 关于出版物与社会变迁

在每一次巨大的社会变革之前,似乎都要发生一场知识传播的革命,而每一次知识传播革命的爆发都有着特定的诱因。在印刷术发明之后,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科学革命之前的欧洲也发生了一次被称为“知识爆炸”的知识革命。这一革命的导火索就是基于印刷出版物的以往知识的迅速增加。借助于相对廉价的印刷物,人们可以接触到过去的古典文献,这些古典文献丰富了人们关于自我、社会和历史等方面的知识,使人们获得了从未有过的精神食粮,在让人们形成了新的世界观的同时也构成了思想革命的土壤。这也许就是出版物的力量。

出版物的社会史

在现代意义上的书籍出现之前的中世纪,记忆享有很高的地位,其价值在于人们将其视为美德的载体和思想的工具。在12世纪的时候,书籍的生产已逐渐离开寺院,开始迈进了世俗化的里程。^①对此人们称之为“书籍革命”。形成这一现象的一个原因是大学教育制度的逐渐形成。

从12世纪开始,由于大学的创建以及社会上律师、官吏和商人等中产阶级的形成,社会上出现了新的读者群,书籍的生产渐渐地开始世俗化起来。在这以前,神职人员是书籍的主要消费者,但在

^① Barbara A. Misztal, *Theories of Social Remembering*, Open University Press,

2003, p.12.

大学制度形成以后,教授和学生又成了主要的读者群之一,大学用书的定期性和规模性也构成了书籍生产的主要动力。

中世纪的教学方法鼓励做课堂笔记和熟读强记,学生们所需要的基本的参考书多是靠自己抄写或是雇人抄写,他们也可以向专业的抄写员订购书。来自大学的这种需求,导致了大学城里书记行会的形成,书记通常由神职人员担任,其中也有一些世俗人士。由于他们被视为大学的一个分支,因而享有一些优厚的待遇,如可以减免部分捐税和免除哨卫差役等。

从这时起,知识生活的中心已由修道院转移到了大学,书籍生产的主要人员构成则成了教授、学生、工匠和技师。

在印刷书籍出现之前,抄写本制度(pecia)曾盛极一时,但后来僧院抄书房(monastic scriptoria)又开始占主导地位。这一现象被称为僧院抄书房最后的黄金时期(last golden age)。^① 在印刷术出现以后,僧院抄书房又随即应用新的印刷技术来印制书籍,1470年前后,在德国至少有7家僧院抄书房。^②

为了保证手抄本的质量,在手抄本的誊写方面,大学制定了一系列的管理措施。如手抄本的范本的字体都比较大,而且必须经过认真的检查和校订。抄写完毕,范本必须经归还出借者后再出借给他人。而且,在出租时把书分成若干部分,以便不同的人可以同时抄写同一本书。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大多数抄本都来自于同一个范本,避免了以讹传讹。有问题的范本将会被立即调回。至于租金,则是由学校规定好的,任何人不得私自调价。这种抄写本制度一直沿用到中世纪结束。

在15世纪中期以前,手抄文化(scribal culture)文本皱褶不平、缺少一致性。早期图书馆里的藏书多会起皱,而且在经过不计其数的抄写之后,文本也开始破损。这时期的文本难以保存,其对社会的影响也是有限的。一般说来,其读者对象主要是僧侣和为数很少的大学学生,人们传播这些稀少文献所储存的信息的方式主

^① Elizabeth L. Eisenstein, *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14.

^② Ibid., p. 15.

要是通过大声“朗读”口头传播给听众。

15世纪中期,古登堡发明了印刷术,由此而来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使出版物成为一种时兴的大众媒体,以往孤立的个人开始成为受众,信息的大规模传播成为可能。在印刷术发明之前,读书多是一种个人行为,其唯一的例外是,人们有时会聚集在一起听识字的人念书,以故事为主要内容的听书也是人们得以社会化的一条主要途径。在印刷术出现以后,同一性(uniformity)、同步性(synchro-nazation)随之成为一种全新的观念。

直到18世纪,人们还不把印刷的书籍视为知识的可靠载体,中世纪的著作被看成是对一个知识实体的摘要和记录,人们常常要以此追溯到口头语境;在中世纪的寺院传统中,人们对于书写的语言持有一种不同的看法,原因是因为人们认为最终要在个人的记忆中去寻找这些书写的文字的依据,人们没有把书看成是人类记忆的替代物,书籍只是人们用于帮助记忆的东西;在启蒙运动时期,人们拒绝了记忆的艺术,原因是人们开始珍视观察、实验、智力和推理,这意味着记忆艺术的终结在神话和历史之间出现了一个明确的分界线。^①

在17世纪,随着记忆艺术的衰落,传播以往知识的功能开始脱离人类的声音,人们开始求诸于书籍;并且,随着印刷的历史书籍的传播的增加,人们开始认识到历史中的真实状况。^②

在印刷文化出现之前,由于手抄本都是相对独立的复制物,其复制和流传都缺少组织性和规模性,对于手抄本的数量从来就没有一个大致的估计,这种模糊性、缺少规范和难预测性也正是手抄文化的一个显著特性。但在印刷出版物出现之后,人们可以获得完全相同的出版物,通过阅读文化人们得以获得的一个全新的观念是,规范性和统一性。这种一致性不仅是形式上的,通过印刷书籍,人们也习得了共同的行为和思维方式。

^① Barbara A. Misztal, *Theories of Social Remembering*, Open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36.

^② Ibid., p. 35.

出版物与近代社会的形成

L. 费夫尔曾称这种接受知识方式的变化为由“耳朵的时代”到“眼睛的时代”。后来这一观念又为麦克卢汉所发扬光大。^① 有观点认为,印刷物的出现也使得人类文化由意象文化(image culture)转换为文字文化(word culture)^②,尽管人们对这种转换有不同的看法。如果说这一说法成立的话,那么,这种转换所侧重的也许是准确性和稳定性。

“处于不同地方的人们可以同时浏览完全相同的图像、地图和图表,这本身就是一场传播革命。”印刷术的发明使书籍的大量生产成为可能,从而催生了经营书籍的书店,为不同文化间的信息传播和交流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③

在手抄本时代,信息的传播主要经由口头传播、特殊的记忆工具和文字,信息传播的范围有明显的局限性。但在印刷出版物出现之后,文字信息成为更有效的传播方式,其受众范围也获得了革命性的拓展。知识和信息的传播由此不再局限某一地点和空间,一个抽象的符号体系也得到了进一步完善。这种传播方式对人们的价值意识所产生的一个直接影响是,人们不再把年长者看成是有学识的人,因为一个年轻人完全可以靠勤奋来获得学识。

在可以通过研读书籍来获取知识的思维方式形成以后,基于记忆等因素的信息传播方式逐渐式微,“集体记忆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换”^④。在印刷出版物进入市场之后,商业动力使书籍流通的范围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在印刷出版物的数量不断增加的同时,历史上的手抄本也被大量付诸机械印刷。对于知识的推广和传播来说,机械印刷术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不同文化间的交流无疑会刺激人们的智力活动,大量的文本的出现,为新的观念和方法的形成打下了基础。在16世纪出现了所谓的“知识爆炸”(knowledge explosion)。就知识的探求来说,由于人们可以购买到

^① Elizabeth L. Eisenstein, *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41.

^② Ibid., p. 67.

^③ Ibid., p. 53.

^④ Ibid., p. 66.

相对廉价的印刷出版物,可以对不同的版本进行比较,而不必再依赖于注释者或权威人士的意见。由此,在不同的出版物之间进行相互参照(cross referencing)的时代便开始了。^①

有学者认为,印刷书籍促进了异文化交流。而且,文艺复兴是价值观撞击和演变(transmutation of values)的结果。并且,文艺复兴只不过是重新洗牌(reshuffling cards),其中许多牌都是旧的,但由于历史和社会环境不同,这些牌又都是新的。印刷出版物在降低了人类文化交流的成本的同时,也为不同文化间的交流提供了方便、准确和可靠的交流方式。通过文字进行符号化和记载,不同文化的精神体验可以得到不受时空限制的传播和共享。

印刷术是早期学术和科学活动的先决条件。^②

由印刷出版物所带来的标准化和规范化的现象对人们的意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从本质上讲,始于十六七世纪的西欧的现代化进程,实际上就是一个标准化和规范化的进程。这种标准化导致了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趋同性。

在16至18世纪之间,当人们开始用印刷机印制书籍时,新的书籍形式对人们的思维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人们将其称之为“白彻底地击败了黑”。通过用段落来分割连贯的文本和首行缩进以及空格来引进的间歇空间,使人们在阅读时可以停顿下来进行思考,从而导致了对话的秩序的形成。新时代的出版人通过拆分文本,无论在视觉上还是在思维方式上都使人们的阅读行为大为改观。^③

人们在印制《圣经》时也采用了这种新式的排版和装帧方法,对于把《圣经》中的文本分成章和节,洛克感到难以接受,他认为,这有可能打断神的语言的强有力的整合性。而且,任何一个教支和派别都可以通过《圣经》的一个段落来证明其正统性。^④

在《想象的共同体》中,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曾指出出版物在社

^① Elizabeth L. Eisenstein, *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72.

^② Ibid., p. 111.

^③ Roger Chartier, *The Order of Books*, Polity Press, 1994, p. 11.

^④ Ibid., p. 12.

会的变革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他认为“印刷品(print—as—commodity)是孕育全新的同时性观念的关键”。书籍对人类文明进步的一大贡献是加快了人们相互之间交换信息和观念的速度。用弗朗西斯·培根的话来说,就是印刷术已经改变了这个世界的面貌和状态。到1500年时,欧洲至少已经印行了2 000万本书,这也即是本雅明所说的“机械再生时代”的发轫。而到1600年时,印刷的书籍已达2亿册。

而且,一旦出版业作为资本主义的企业形态被确立下来以后,书籍出版商便在不平地拓展着自己的市场,印刷商纷纷在欧洲各地建立分厂。从1520年到1540年的20年时间,用德文出版的书籍的数量比1500年到1520年这段时间所出版的书籍数量的3倍还要多。在1522年到1546年间,共出版了430种路德圣经译本。在新教与罗马教廷之间展开的“‘争夺人心战’中,新教正因其深谙运用资本主义所创造的日益扩张的方言出版市场之道,因而基本上始终采取攻势,而反宗教改革一方则处于守势,捍卫拉丁文的堡垒。……最能让人体会这种受困的心态的是弗朗索瓦一世在1535年恐慌地下诏禁止在其领地印行任何书籍——违反者处以绞刑”。^①

在上述意义上,出版物既是社会变迁的催化剂,也是社会得以维系的黏合剂。

2.2 关于美国对战后日本媒体所实施的改革的研究

要论述战后日本媒介的形成和起点,就不得不涉及美国在战后对日本媒体所实施的改革。在论及战后改革时,日本学界的观点也不尽相同,尽管其中不乏左中右的观点,但从政治的角度来说,对战后以美国为主导的对日改革,如今人们议论最多的是其不完善的一面。首先,就日本国宪法而言,由于在该宪法的第九条规定日本永远放弃战争且不再拥有军队,因而这一对日本有限制作用的条款始终是日本人要求修改宪法的动因。不少日本人认为战

^①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睿人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年,第48—49页。

后日本的宪法是战胜国强加于战败国的,由于其不能反映本国人的意志,因而要加以修正,也就是说,日本国的宪法应由日本人来制定。在战后初期的日本,由于美国采取的是严厉的审查制度,从而形成了一个“封闭的语言空间”。^①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如同宪法一样,战后日本的许多制度和政策,都是美国所强行加予的,所以要对战后改革进行总的“清算”。

有的学者尽管不从正面否定由美国所实施的改革,但也在指责美国式改革所存在的问题,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观点是“未完成的改革论”。这种观点认为在战后初期美国在日本所实施的改革是正确的应予肯定的,但在朝鲜战争爆发后,迫于“冷战”的需要,美国便放弃了对日本进行民主改革的计划。如在国家机关和企业中清除共产党员,被开除了公职的战犯又重新得到重用等。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所要批判的是尊重民主、自由和个人权利的美国并不以理念为重,日本社会的发展和未来在美国的国家战略中仅居于次要地位。^②

上述两种倾向也大致可以概括日本人对战后初期由美国所实施的对日本的大众传媒的改革的态度。即美国式的改革是极具片面性的,日本媒体所享受的“自由”被附加了许多限制条件。占领军虽称媒体应自由,但与占领军有关,尤其是不利于占领军的报道则在被禁之列。因而这种自由显然不是真正的自由。

有一种倾向认为,就美国对日本媒体的改革政策来说,在其出发点上就存在很大的问题。占领当局在对日本媒体进行改革时,没有要从根本上清除日本旧有的行政势力对日本媒体的影响的设想,而且甚至还有想借助旧有的统治机构来进行改革的幻想,这一点从最初制定的媒体改革计划中也完全可以看得出来。也就是说,对日占领政策制定者认为,日本的媒体在本质上是热爱民主和自由的,因而,在军国主义者被解除武装后,日本的报纸和电台等

^① 保冈兴治:《宪法制订过程中的逸闻与宪法知识》, www.yasuoka.org/doc-seisaku/kenpo/oz.htm 关于对美国在战后所实施的改革的评价,可参见江藤淳:《封闭的语言空间》,东京:文春文库,1994年。

^② 参见油井大三郎:《未完的占领改革:被美国知识分子所抛弃的关于日本民主化的构想》,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89年,第267—268页。